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
(项目批准号: 11YJA751085) 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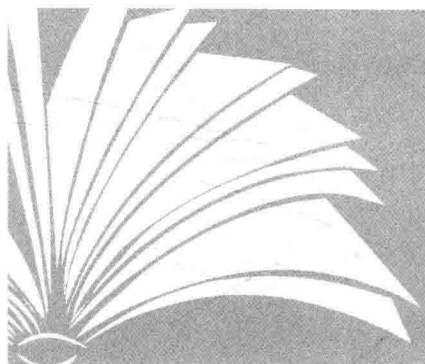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

杨胜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
(项目批准号: 11YJA751085) 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

杨胜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左翼文学 / 杨胜刚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54-0719-7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左翼文化运动—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7605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梅 一
责任编辑 李一梅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印张 22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

第一节 国民革命历史规定性的形成 // 008

一、中共“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 // 008

二、国民党对“国民革命”思想的接受和扩散 // 019

三、中共退隐于幕后的“国民革命”政治实践 // 024

第二节 左翼文学发生期的形态——革命文学 // 031

一、20世纪20年代中共党员对革命文学的提倡 // 031

二、何为“革命文学”？ // 034

三、“革命文学”：讲述别样的中国故事 // 038

四、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开始 // 043

五、“混合型”革命文学 // 053

第二章 革命的巨大转折与无产阶级文学

第一节 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调整 // 057

第二节 党对文艺运动的介入和革命文学论争 // 060

一、中共对文艺运动的政治介入 // 060

二、革命文学论争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呼应 // 069

第三节 “革命遗事”讲述与“革命理论”演绎 // 095

一、“革命遗事”与国民革命 // 096

二、“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 // 101

第三章 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对左联和左联文学的牵引

第一节 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110

- 一、左联成立是否接受了党的指示 // 111
- 二、中共党组织对左联的渗透和在左联中的运作 // 118
- 三、左联与党组织的松散关系 // 129

第二节 左联前期的写作对中共革命的追随（1930—1931） // 144

- 一、左联前期党派色彩浓重的言论 // 144
- 二、左联前期政治立场鲜明的文学活动 // 149

第三节 向文坛自身回撤的左联后期文学（1932—1936） // 155

- 一、回撤的因由 // 156
- 二、烈度与热度的消减 // 163

第四章 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道义书写

第一节 将自我“奥伏赫变”——知识者的革命叙事 // 172

- 一、革命压倒了一切？ // 172
- 二、青春迷思与转型焦虑 // 181
- 三、以“志士精神”为旗 // 188

第二节 代底层发声和抗辩——工农革命叙事 // 193

- 一、无“诗意”的苦难实录 // 194
- 二、反抗与暴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幻象 // 203
- 三、素朴：一种穿透现实的力量 // 213

结论 左翼文学：“为政治”的文学

- 一、非党派性的左翼文学 // 220
- 二、“为政治”的左翼文学 // 223

参考文献 // 229

引 言

本课题把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为考察的中心。

在进入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说明我是在怎样的历史规定性上理解这一论题涉及的一个中心概念——“左翼文学”的。长期以来，左翼文学被赋予一种整体性想象，被用来指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配合的一种文学形态。“在一般的理解中，它指现代文学历史中一批政治上隶属或同情于革命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作家所进行的创作，他们在革命政党的影响或领导下所进行的带有政治性的文学活动被称为‘左翼文学运动’”^①。按照这种理解，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左翼文学发生形态的“革命文学”、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等文学形态都被包含在“左翼文学”之中，特别在文学批评领域，作为一个批评性话语，人们更是在一个整体性观照的视角里来理解“左翼文学”。但是在很多时候，“左翼文学”又特指 20 世纪 30 年代以左联为核心、以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为中心的文学。当人们这样来理解“左翼文学”时，它又作为一个指涉范围相对狭窄的文学史概念被使用。这说明，不同的人对“左翼文学”有多种不同的认识，而在运用“左翼文学”时又把它当成不言自明的概念，按各自的理解不加区分地使用，使“左翼文学”这个词缺乏确定的内在规定性，在批评和历史的范畴内相互纠缠。由于本课题更多是在历史的层面展开，为了避免含混，更为了探

^① 程凯. 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75.

究历史具体形态的需要，有必要给“左翼文学”这一概念以一种较清晰的规定。本课题倾向于在较狭窄的文学历史领域使用这个概念，即按许多文学史的做法，把自1927年兴起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以传达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书写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想象和情绪、以左联的文学和活动为其核心的文学形态称为“左翼文学”。左翼文学的基本题材为：渲染底层工农民众遭受沉重的剥削、压迫的惨痛社会景象和他们在无路可走的境况下反抗意识觉醒，走上行动和斗争道路的情形。左翼文学的另一个基本题材是描述和抒发知识分子为革命所吸引，逐渐从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思想意识中走出，克服了自身的动摇和软弱，投身到为被压迫阶级、劳动阶级求解放的革命中去的历程和情感。左翼文学直接从当时文学之外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观念吸取灵感和思想资源，为外在强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理念所主导和推动，可看作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革命思潮的直接回响，与中国革命运动紧相联系。因此它以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理解中国革命和现实的基本思想框架，并以此为依据描述中国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图景，展开和表达当时的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想象和情感。对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做这样的限制，就把它和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出现的延安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区别开来。之所以要做区分，主要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各自生长的历史和政治生态环境、主导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生产和流通方式有非常大的差异，前者与后二者在政治指向、具体的表现形态上也判然有别。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文学现象，把中国共产党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理解为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谓“领导”，按词典的释义应为“带领、指引和主管、指导”。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确是对左翼文学进行了领导，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学进行了“带领、指引和主管、指导”，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定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措施对左翼文学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较严密和系统的“带领、指引和主管、指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左翼文学实施了这样的领导呢？本课题没有简单地将这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结论而广泛被接受的“事实”作为既成的结论，而是把这个“结论”充分地

问题化，对长期以来被当成“当然”的这一“事实”进行考辨。

一个党要对文学实行有效领导，必然要在文学方面开展较系统而持续的工作。首先，必须确立它对文学的思想领导，即必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适应本党政治政策的思想基础和思想规范，给文学的展开指定思想的方向和风向标。有无思想方向的指引可以看作是一个党是否积极地有意识领导文学的一个表征。就像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的发展指定了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延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兴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再次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方向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这一方向的确立，为新中国文学奠定了“人民性”的基调，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见，党在思想上对文艺的方向进行确定是其实现对文艺领导的基础。其次，党要想领导文学，还必须建立其对文学组织上的领导，必须建立领导文艺的一整套组织机制，只有建立起一个系统的、严密的组织机制，才能保障文学沿着党指定的方向行进下去。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和国家对作家进行领导和管理的机关——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其中中国作协“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①，而众多的专业作家被组织进各级文联和作协这样的国家机关，即使不在各级文联或作协，也一定被编入某一级别的其他国家机关，成为一个“单位人”，从而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中国文联和作协，发动和推进一系列的活动，来保证党对文艺的领导，保证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党的思想和艺术路线的遵循。所以是否建立起对文学进行约束和规范的一套组织机制，是党能否领导文艺的又一个标志。再次，党能否领导文学，还要看党能否经常性地开展、组织和发动持续性的活动，随时对作家个人或整个文坛的活动进行规范。光有指导思想、组织机制，并不意味着党就能对文学实行有效的领导，党如果不能通过连续性的日常工作，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

推动相关人员按照党的思想艺术路线不断从事个人或集体的文学活动，就可能让党的思想指令成为一纸空文，让组织成为一具空壳。在新中国建立初的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文艺，让文学体现党的意志，经常性地文艺界开展一系列的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通过这些批评和批判活动随时对写作者进行调节和控制。洪子诚认为这些文学界的批评和批判运动“承担了规范的确立、实施的保证”，“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加以警示、打击”^①。这说明党经常性地发动一些自上而下的活动是党能实际领导文学的保证。党是否正常地、持续地开展这些活动是党能否领导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本课题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以党领导文艺所必须采取的以上三方面的具体举措为参照来考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针对左翼文学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以此透视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左翼文学运动进行了引领、指导和管理。除此之外，左翼文学运动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或呼应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现实政治斗争，左翼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本课题考察的一个中心。组织的意志能否被很好地执行，是判断组织领导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本课题在探讨党是否采取了积极的领导左翼文学的具体举措时，还要对“领导”的实际效果进行考察，即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和就文艺所发出的指令是否能在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或文学创作的活动中执行下去，并通过左翼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写作整体地反映出来，也将被作为考察的一个方面。只有对这方面的问题做出澄清和说明，才能判断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学的牵动到何种程度、中国共产党为介入左翼文学而采取的行动对左翼文学的开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何。有了以上两方面的深入探究，才能对党在怎样一个程度上领导左翼文学给出一个较全面的说明。

由于本课题主要是在历史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所以本课题将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多歧性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而避免过多地阐释和理论化的解读。左翼文学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外在于文学的更大的社会政治革

^①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第 2 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

命运动的产物和回声。当然，左翼文学不可看作是对当时政治革命运动及其进程的具体回应，作为一种观念性很强的文学，左翼文学更多是对当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形象演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反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革命活动所遵循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然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最具备带动力的部分。不过当时指导中共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战略、策略思想都正处在调整、建构和充实的过程中，而且它在当时的思想界还没有取得唯我独尊的绝对思想威权地位，一些作家可能会从中共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吸取一些东西，也可以在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中掺杂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甚至有些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可能不是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来，而取自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革命思想系统。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在当时还缺乏明确无疑的内涵和边界，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稳固和完全统一，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内核，但无论是作为党的中心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思潮形态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个人领悟的空间。另外左翼文学虽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号召，与中共的政治革命实践和革命理念相呼应，但它却主要在国民党政权控制的区域内存在。要在一个与之对抗的现有政权的管制下生存和发展，它是否会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自由无遮地表达出来呢？何况，左翼文学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但它的生产和流通又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方式，那么左翼文学对资本主义市场是否会有所妥协呢？左翼文学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的面貌必然是复杂的。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不稳定和无绝对的威权，而左翼文学又在一个中共政权管制之外的区域生长，这使中共对作为革命文艺一部分的左翼文学的吸纳和统合作用不可能是绝对控制的，左翼文学对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回应也不可能是完全追随和从属的，或者是完全迎合和被动的，而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想象，参与对革命的讲述和塑造。所以左翼文学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回应也必然是情形复杂的。本课题对左翼文学与中共政治实践关系的考察正视历史的复杂与混沌，排斥绝对化的认识对研究的干扰。

本课题的研究将以揭示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展开的动因和推演的真实脉络、它基础性的理论、它理解中国社会的革命理论、它面

对自身的问题和政治局势而做出应对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作为起点。为什么对左翼文学的研究要以考察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作为起点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左翼文学重要的作家大多为中共党员，他们的左翼文学活动容易受中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并非只是表达用暴力推翻既有制度和政府的暴力革命，它实际上包含对中国社会及其革命的全盘性认识和思想，其中亦包含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关系、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革命的路线和策略及前景等多方面的认识，就是说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实际上提供了理解当时中国的整个认识图式。作为左翼文学运动中心力量的共产党员作家自然会把这一政治意识形态中展开的中国图式引用到左翼文学的写作中，他们所建构的左翼文学自然会受到来自本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牵引。所以，我认为对左翼文学的探究不能不以梳理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推演为起点。不过，由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处在变动之中，并不稳定，也不绝对统一，特别在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的认识上，党内一直存在思想和策略上的分歧。而且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影响着中共党人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左翼作家队伍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中共党员，他们在思想认识上虽趋于无产阶级革命，但往往带着自己固有的个人认识和想象参与到左翼文学的建构上来，这决定了中共的革命和左翼文学的联结必然是情形复杂的。所以本课题也将力图揭示左翼文学界怎样理解中国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借重的是何种思想资源，左翼文学界的文学活动到底处理和回应了哪些中共政治革命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命题，它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与现实的中共的政治革命发生联系，对中共的现实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生产起到何种作用。

因此本课题要解答的中心问题是中共在 20 世纪 30 年代看待文艺的逻辑如何、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状况、这一革命对文艺提出了哪些要求，而左翼文学又对中共革命做出怎样的回应。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强调从历史的内在脉络和复杂性上重新审视左翼文学与中共现实政治革命的关系，还原二者之间错综的联结方式，在一个更开阔的地带呈现左翼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前一直简单地

把左翼文学置于革命史中去认识和领会，笼统而整体地把左翼文学看成是机械

地服务于政治革命。这种延续了很久的本质化理解左翼文学的模式既无视历史本身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本真状况，也阻止了进一步研究左翼文学的可能。现在是突破以往的研究视野，对左翼文学与中共的政治革命实践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和估量的时候了。

为了对左翼文学与中共的关系做出更全面的说明，本课题把考察的范围向前推延，所以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发生期的左翼文学亦将被论述到。为了论证的方便，本课题将左翼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论争时期、左联时期，本课题的论述亦是按以上三个时段依次展开。

第一章 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

第一节 国民革命历史规定性的形成

一、中共“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

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封建社会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不可逆转。不经历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前发生的任何早前的社会革命，最终必然是徒劳的。“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一切的历史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①。

按照上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是离 20 世纪 20 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还非常薄弱的中国异常遥远。没有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社会民主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332.

统，文化上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亲缘关系，又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是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但历史似乎总是自行其是，全然不顾理论的框限和预言，不做在理论的身后亦步亦趋的仆从。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被研究、被传播，甚至被一批中国人风生水起地实践起来。历史的发展出人意料，所以莫里斯·迈斯纳才会感叹：“现代历史上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是：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①

早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已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有了些微和模糊的了解，十月革命后到 1921 年，中国开始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规模仍很小，且这些翻译的译文和译著并非都能忠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这时也还没有译出，它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的出版要等到 1938 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思想一样，只是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那里闪烁着点点思想星火。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自 1920 年起，在中国许多地方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乃至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建立起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虽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它们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都不是全职的，在实践方面也只是做了一些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初步工作。比如 1920 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张国焘、邓中夏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火车站创建了教育工人和其子女的学校。张国焘他们在这里不仅教授普通的文化课程，让工人参加关于劳动人民的状况、罢工斗争等问题的讨论，还向工人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并号召工人建立工会组织；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参加建立机器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和纺织工人工会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接近中国工人的工作过程复杂，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组织的工会会员极少、组织相当薄弱，极不牢固。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它们所建立的工会组织在

^① 莫里斯·迈斯纳.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0.

组织上非常松散，还不可能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实践马克思主义有效、有力的现实政治力量。而且这些小组成员“成分非常复杂，远非所有的参加者都是笃信共产主义的。他们中间有无政府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有一时受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民主主义者，后来，如陈公博、戴季陶、周佛海、甘乃光、邵力子等这样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党员也曾加入过共产主义运动”^①。即使到1921年，当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所以郭恒钰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社会主义、巴枯宁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和甘地主义，充满了‘秘密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充满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所有思想活动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要组织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比困难的”^②。他甚至认为在建党的代表中间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努力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革命战斗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为的早产，客观条件在那时尚未成熟”^③。

但无论怎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然初生的共产党还带有早产的稚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非常薄弱等各方面的不足，但就是这样一个似乎先天不足的政党从此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天辟地地在中国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共在成立之后是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实践那似乎离中国现实太遥远、似乎与中国水土不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宣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至阶级的差别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手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形式，目标是

① B.N. 格鲁宁.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A]. 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64.

② 郭恒钰.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

③ 郭恒钰.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33.

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社会公有。从纲领的表述可以看出，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淡化或回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论断，表现出可以绕过或跨越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另一方面，纲领也反映刚刚开始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主要信条的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纯粹和绝对的想象，即并不注重中国现实的状况，而认为中国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应该是绝对的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这一纲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些基本思想，有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定的一面，也有教条化的一面，但极富理想主义色彩。

但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中共一大那太绝对、太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并没有按一大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走下去。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初期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革命实践选择了另外一条比较现实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这一套民主革命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被具体表述为“国民革命”思想。

据考证，“国民革命”一词较早出现于1906年秋冬。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在这里“国民革命”一词与“英雄革命”相对，是指一国之人皆应有革命的精神和革命之责任，强调的是革命需要民众的力量和参与，孙中山他们在此还没有把“国民革命”发展成一套系统的革命理论。这个名词在以后16年一直没有见到使用。1922年，陈独秀在创办不久的《向导》发表《造国论》，认为“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来证明的”，“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这里陈独秀给“国民革命”一词以重新解释，在其中灌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认识，赋予它新的政

治内容^①。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将“二大”确立的“民主革命”改称为“国民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三大还喊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之所以改名，陈独秀解释，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②。这表明中共三大开始把当时中国的革命命名为“国民革命”，这是党的集体意志，“国民革命”一词被中共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此后直至1927年，中共就以“国民革命”相号召，凝集党的意志、汇聚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动中国革命。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和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各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理论。列宁这一理论包含多个命题，如反帝民族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同盟问题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与帝国主义关系中的从属国的民族课题与阶级课题的结合及其相互关系；重视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即劳动联盟；民族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态等。对民族殖民地国家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和策略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和指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革命思想也主要是以此为依据。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发展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已粗略地表达了共产党“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对“民主主义革命”就有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到1923年、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逐渐稳定下来，并被明确表述为“国民革命”的思想，成为中共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前的基本指导思想。

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到底赋予“国民革命”这一思想以哪些内容呢？从中共一大、二大和三大的文件来看，中共“国民革命”思想主要是阐述中共对中国革命应走道路的理解，但在这一理解中也包含了对当时中国社会

① 沙健孙. 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册[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115-116.

② 陈独秀.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J]. 向导，1925：128.